

阶级意识误识与工人政治研究

——评裴宜理著《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

田 耕

“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简而言之，这就是本书的论点。”裴宜理这样归纳她对中国工人政治的考察。¹在这本著作中裴宜理详细考察了1949年以前上海的工人运动，其核心问题是“工人阶级分化的原因，以及此种分化对政治运动的影响”。²对这一问题，裴宜理采用了两条基本的分析主线：一方面是根据上海工人的行业分化（运输业、纺织业、烟草业）来考察工人阶级由于技术等不同因素产生的差异，以及这些差异如何形塑了此一阶段工人阶级活动的特点；另一方面则是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一“保守主义”时期和“激进主义”时期一来分析工人政治与其他各种政治力量的关系。综合以上两个方面，裴宜理认为，“工人阶级…因为性别、政治信仰、技术、家庭背景等造成的差异，不能完全视为共产主义革命的障碍，工人阶级亦可能因为此故产生有影响的政治行动”。³也就是说，通过“上海罢工”的政治研究表明，不仅不存在一般意义上因为阶级意识（class consciousness）而产生的“铁板一块”的工人阶级，也不能认为是“阶级意识”促使工人政治行动的产生。相反，恰恰是因为工人阶级中存在着“深深的裂痕”，这使得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政治努力“都能利用其中的一些群体”，而在这个过程中，“政党和政府都经历了根本的变化”，⁴从而在工人阶级中获取对其政权建设努力的支持。而这种“工人政治”的影响也深入到了1949年以后的中国政治中，简而言之，对工人政治的考察“必须追溯普通工人因来源和地方传统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及其对现行的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⁵裴宜理在本书中试图证明，源自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学说的各种工人政治研究在理论上的误区：总是试图将某种“统一”的（尤其是阶级意识统一）的工人阶级与实际的政治力量作因果的联系，这是本书的总结部分所要说明的。

¹裴宜理 2001,《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 328 页。

²同上书，第 8 页。

³同上书，第 2 页。

⁴同上书，第 95 至 96 页。

⁵同上书，第 352 页。

贺箫认为，要讨论在中国近现代史中的工人阶级研究的“沉默”，一方面要扩大研究的视角，尤其要包括工人阶级与国家、工人阶级与各种暴力性以及非暴力性权力运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则要返回到工人阶级“内部”，去分析他们如何将自身的各种特性体现在特定历史情境下的行动策略当中（Hershatter 1986, 5-6）。⁶我们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讨论本书中的一些问题。

—

虽然裴宜理直到本书的末尾部分才明确针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发展过程的批评。⁷但这无疑是本书在工人政治理论上关注的焦点。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讨论这本著作。

帕金斯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以及无产阶级斗争的论述概括为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发现”（discovery of proletariat）。而这一命题包含的核心的思想是，以 1840 年革命为界，马克思在哲学批判和社会经济分析的基础上完善了以“革命使命”（revolution mission）为中心的“无产阶级”的意涵。⁸正如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所说的那样“问题不在于目前某个无产者或者甚至整个无产阶级把什么看作自己的目的，问题在于究竟什么是无产阶级”。⁹

在这个命题下，非常关键的一点是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的独特含义不能够完全返回到对工人阶级现实状况的经验考察，特别是不能认为它是在总结马克思 1840 年后对法国工人政治和运动的考察，而忽视了马克思对无产阶级的考察是建立在革命“使命”（mission）的前提下。帕金斯指出，在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的斗争并不是出于自身愿望和生活处境之间的矛盾。这里有两重含义：首先，并不能从共同的“受剥削”状况走出统一的无产阶级去进行革命，那么工人政治根本上就不能从受剥削—反抗—革命的简单因果关系上去理解，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实际的生活就是建立在财产、货币、资本、雇佣劳动，诸如此类的基础上，“是自我异化十分实际，十分具体的产物”。这是马克思那里，无产阶级作为承

6 Hershatter, Gail.,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85-86. 比如在讨论工人的乡村来源与他们在城市中的动员的关系时，前者的作用就具有各种混杂的特殊性（messy specifics），既可能使工人发展出融入和顺从城市环境的办法，也可能因为乡村的关系模式的移植而提高工人的战斗性（同上书，p. 6）。

7 裴宜理 2001，《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 343 页。

8 Perkins, Stephen., *Marxism and the Proletariat : a Lukacsian perspective*. London : Pluto Press. 1993.

9 马克思《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 45 页。

担革命使命的阶级与之前的种种反抗政治最重要的不同。其次，革命的使命表明无产阶级不仅是有革命的“理想”(idea),也有着利益(interests)和需要(need)。无产者作为与私有财产对立统一,实质上反映了马克思认为“人”能够在群众的存在和生活中真正成其为人的观点。¹⁰为什么无产者不能接受经济学家的“好心建议”呢,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生活经历,更重要的是无产者的生活处境就使得他们以一种与眼前利益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事情。¹¹所以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的意义正是在于“这种意识到自己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贫困的贫困,这种意识到自己的非人性从而把自己消灭的非人性”。¹²因此,阿洛诺维茨(Aronowitz)指出马克思那里的“工人阶级”首先要从与“生产方式”的关联中去分析。¹³他强调“剥削”(exploitation)和“支配”(domination)之间的差别,在他看来,马克思并没有使用受压迫最深(oppression)或者受支配最深来描述工人阶级,而认为它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受剥削”最深的阶级,而这一判断含义之一就是资本使劳动力(labor)从以往庄园式的依附中解脱出来,这种“依附解除”恰恰是工人阶级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特点。¹⁴因此我们并不能认为马克思的无产阶级学说和工人研究的“范式”就是建立了“贫穷”无产者经过克服所谓的“封建遗产”式的分裂和散漫,产生所谓的“阶级意识”,从而才能发动革命的过程。而在裴宜理看来,从马克思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工人研究,都犯了这个错误。

裴宜理批评法国历史学家谢诺(Chesneaux)所持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工人阶级运动的观点,即工人阶级基于“共同处境”(共同受剥削的地位),通过斗争形成了与之前的工人团社传统等对立的统一阶级意识的观点。¹⁵但是,从汤普森(Thompson)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经典研究就可以发现,即非工厂制、也非工业革命缔造了“新人类”,而是在“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当中才产生了塑造工人阶级以及后者塑造自身的可能。¹⁶而无产阶级所以能紧密团结,“不仅是因为他们在

¹⁰ 同上书,第66页。

¹¹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195至197页。

¹² 马克思《神圣家族,或对批判的批判所做的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第44页。

¹³ 正是在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中,帕金斯认为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找到了工人联合具有“政治特性”的可能,恰恰是出于工人们希望保持工资这一事实,使得其联合也促成了资本家的联合。因此说工人运动是如何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是简单化的(Perkins 1993, 52-3)。

¹⁴ Aronowitz, Stanley., *The Politics of Identity : Class, Culture, Social Movements* New York : Routledge. 1992.

¹⁵ Chesneaux, Jean.,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p.230-231.

¹⁶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第211页。

同样的处境上忍受贫穷，而且还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和许多人在一起工作，一起协力并相互依存”。¹⁷在上述与马克思的阶级理论关联紧密的研究中，虽然强调阶级意识生成的重要性，但却是把阶级意识放在工人日常生活的政治行动中去考察，从而“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而没有简单地视之为克服传统或者是“封建遗产”的结果。这一点与裴宜理强调的工人阶级“因为性别、政治信仰、技术、家庭背景”造成的差异和分化对政治活动的重要意义并不冲突。¹⁸

正如裴宜理本人提到的，她希望可以避免上文中在她看来“的阶级意识”误识而重新将工人阶级作为研究的中心放回到近现代史的社会政治背景中去。所以，在简单的理论检讨之后，我们需要讨论裴宜理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避免这种误识从而进行更贴切的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研究。我们从这本书最为重要和精彩的地方——上海工人罢工中的工人政治与政党政治关系的分析——来入手讨论。

二

裴宜理的研究发现工人阶级中存在着的“深深的裂痕”不仅是政党政治的基本条件（因为两党都没有办法实现对整个工人阶级的影响和控制），更是后者政治目的实现的基础，因为两党“都能利用其中的一些群体”，¹⁹从而通过工人运动获得各自的工人基础。²⁰并且工人阶级的这种“裂痕”（裴宜理也称之为“阶级内部团结”）与两党之间的关系有密切关联。

但是，裴宜理是怎么将政党政治的意义体现出来，同时也避免了上面我们所说的那种“阶级意识”的误识呢？首先，在分析罢工的政治过程时，国民党和共产党在裴宜理那里都经历了类似于“结构化约”的办法，即罢工作为政治过程，在其中政党作为具有政治目的的行动单位，与外国资本、帮派势力、租界势力、工人团体其他单位之间建立关系。²¹这在裴宜理对特定罢工个案的详细描述中体

¹⁷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 1789~1848》，王章辉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第282页。

¹⁸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种“关系”，他并不认为阶级意识的生成就是要把工人从单个状态的“无产者”聚合到没有“裂痕”的群体，因为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己的历史是确定其含义的”，所以对“工人阶级形成”这样的问题，要放到经济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的脉络中（同注16）。

¹⁹裴宜理2001，《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第95至96页。

²⁰详见该书第4、5、6章。

²¹裴宜理认为“国民党”控制，或者说国民党政府并不代表资产阶级政府，政党政府与阶级之间的距离表现在前者对阶级的分散状况要做出种种“协调”。所以重要的是要理解他们作为不同的政治力量如何参与到罢工这个利益分化的过程中来，这实际上也可以看作是裴宜理对“阶级意识”误识的调整之一，参见本书第五章。

现得非常明显。22 我们或可称之为“利益分化”式罢工（strike as interests-differentiation），即各个政治行动单位如何在罢工中寻求特定目的的实现途径和相应的动力机制。这样，裴宜理的分析才可以摆脱那种通过对罢工目的的简单归类（经济的还是政治的）来判定工人运动的政治导向和阶级意识生成的做法。说到底在裴宜理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治研究仍然是在上层建筑和“基础”（infrastructures）的作用与反作用上做文章：政党如何通过阶级意识的启蒙（当然其政治动员不止这些）来克服掉工人阶级本来的分散与散漫。因而以这样的结构方法讨论罢工同时也就是在不同于阶级意识判断的新取向上重新观察工人运动究竟是处在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当中。通过对围绕罢工的政治策略和具体事件的追溯，我们得以进入到更为实质的政治过程和政治关系的分析中。政党政治实际上也就不再仅仅等同于“领导权”的争夺，而更多地关注政党以什么样的“策略”进入并形塑工人政治的，这是裴宜理所谓的“根本性的变化”。

但也正是在全书最为精彩的地方，我们才可能看到裴宜理分析上的问题。首先，任何“策略”都不仅仅意味着对局势的分析和行动者如何对之产生“盘算”，还包括分析“为什么如此盘算”的问题。对政党政治与工人政治的关系来说，如果我们视政党为参加罢工这一政治过程的政治行动者而与工人阶级发生关联，那么就不能从政党自身去理解其工人运动的策略。而在这个问题上，裴宜理的研究方式非常强调与既往马克思主义研究方向的区别，认为政党（策略）形成往往“就是工人内部竞争的结果”。23 这样实际上使政党政治成为“为工人运动而运动”。贺箫认为，1927 年之后的国民党政府所面临的重要任务，不仅仅是防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罢工重新发生，更为重要的是“提供政治训练”，从而使罢工成为一种“政治渠道”，也就是说，政府要界定并维持什么是“合理合法的”罢工（outright strike）。而这正好是（政党）政府与厂商不同的地方。24 而中国共产党关于无产阶级阵线（proletariat line）的战略在 1928-1948 二十年间也经历了相当的发展。比如，就如何对待国民政府通过 1929 年的系列法案建立的合法工会（即所谓的“黄色工会”）这一问题，托马斯发现，从开始的排斥、分离和破坏到后来的建立“自下而上的联合”（united-front-from-below），实际上也是党内

22 同上书 第 216-222 页以及第 254-72 页。

23 同上书，第 343 页。

24 Hershatter, Gail.,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221-223.

所谓的“激进主义”和“渐进主义”之间权力和路线斗争的结果。25不仅如此，以城市为基础的工人运动由谁来领导，怎么领导，在革命纲领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等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阵线”的重大问题，也与诸如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这样的问题直接关联。简而言之，中国的政党政治并不只是一般的现代政治革命，同样也是社会革命的重要内容。26它包涵了“从革命走向革命”或者说，“通过革命进行动员”的意义，而这恰恰是像裴宜理那样的“放回”本应看到的。

把问题再度引回到裴宜理的著作中，围绕着她分析的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罢工过程”，我们发现，这种分析实际上到最后很难分辨清楚什么是“作为工人政治”的罢工，也就是说恰恰是这种对罢工的分析方式，使得裴宜理形成了所谓的“跨越阶级”（class-crossing）的效果。工人提出的目的和要求的实现方式必须从其他政治行动单位的政治利益分化过程中去理解，或者说工人罢工的目标在政治过程的目标系统中处于最初等级中，这与裴宜理笔下的那个面目模糊的工人形象紧密联系在一起。正如贺箫所说的那样，工人加入帮会的庇护并不意味着帮会是“工人组织”，而当罢工体现在不同阶级背景的团体之间的争斗时，它同时也是“帮派械斗”（gang warfare）。27这实际上告诉我们，面对裴宜理这样的分析方式，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它是“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本身又成为一个要检讨的问题。

三

裴宜理在“无产阶级罢工的遗产”一节中指出了本书中所分析的工人政治是有助于理解 1949 年以后诸如“单位”这样的政治现象的，受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对这一问题继续进行讨论，不过，这同样是裴宜理在“以工人运动为中心”的工人政治研究里的模糊之处所难以避免的结论，实际上，裴宜理的这种模糊还表现在它对工人阶级中的“行会”传统或行会系统（guild system）的看法上，对这种行会系统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作为“传统”意义上工人阶级差异的来源也是值得

25 Thomas, S. Bernard., *Labor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Class Strategies and Contradictions of Chinese Communism, 1928-48*. Ann Arbor :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3. Chap. 2.

26 Skocpol, Theda.,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27 Hershatter, Gail., *The Workers of Tianjin, 1900-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69-72.

探讨的。贺箫在对天津（运输业）工人的研究中发现，与“地缘”、“血缘”这样的特征相比，行会系统不仅是一种前工业时代中的庇护关系，也是一种尺度更大、机动性更强，也更针对非熟人关系的体系。²⁸所以即使在分析工人阶级的“分化”时，分化因素本身的复杂性也是值得关注的。

本文的一些质疑无非是想指出这本著作中涉及的与工人阶级研究相关的问题，而能够体现出所处研究领域所存在的困难本身就是一部作品的价值，因为正是这些问题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研究领域做出进一步有价值的思考。

（作者单位：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

原文刊登于《北大社会学季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²⁸同上书。 p. 117.